

“弗洛伊德不在咖啡馆” ——论佩列文对潜意识论的消解

刘雨馨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俄罗斯小说家佩列文的短篇小说《西格蒙德在咖啡馆》充分显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对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质疑。首先，作家利用西格蒙德（鸚鵡）身份的不确定性，对弗洛伊德的权威身份进行解构。其次，佩列文运用弗洛伊德潜意识论与小说三组人物的行为构成关联，从而实现消解其理论的目的。最后，作家通过讽刺弗洛伊德理论后继者盲目崇拜的行为，进一步表达出对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质疑。

关键词：佩列文；弗洛伊德；潜意识论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佩列文（Виктор Олегович Пелевин），其创作以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而闻名，《夏伯阳与虚空》《百事一代》《昆虫的生活》等是作家主要的代表作品。国内外学界对佩列文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长篇小说，对他的短篇小说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连《西格蒙德在咖啡馆》（Зигмунд в кафе, 1993）这样十分典型的后现代小说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很少有学术论文对《西格蒙德在咖啡馆》进行专门的研究。这部短篇的突出特征是作者利用文学游戏模糊了主人公西格蒙德的身份，使这一形象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人物间关系的不确定。小说中出现三组人物：男士与女士、女店主与男雇员、小男孩与小女孩，前两组人物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他们的关系是确定的。例如：有学者指出，“这两对人物的社会关系分别是情侣关系与工作关系”（Колесникова, Крюкова 2016: 130）。作家通过西格蒙德的视角对三组人物的行为进行分析，并借用弗洛伊德潜意识论与三组人物的行为构成关联，进而消解弗洛伊德潜意识论。在小说结尾，作家揭示出西格蒙德鸚鵡的真实身份，主人公身份的反转体现出对弗洛伊德权威身份的解构。最后，佩列文通过戏仿超现实主义理论家们作品中“钢琴”这一共有的场景，嘲讽超现实主义理论者对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盲目崇拜。

2 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在语言游戏中的体现

小说情节是通过“咖啡馆”展开的。由于处在严寒的冬季，很少有客人进入咖啡馆用餐。在咖啡馆中，三组人物成为主人公西格蒙德的观察对象：男士与女士、小男孩与小女孩、女店主与男雇员。小说中主人公在对三组人物行为的观察过程中，不时发出“Ara（啊哈）”的感叹。与此同时，作家并没有将主人公的身份信息呈现给读者，而是借助语言手段模糊主人公身份，牢牢给西格蒙德贴上“心理学家”的标签。在小说的最后，男士离开咖啡馆前与

女雇主之间的对白，揭示出西格蒙德是一只鹦鹉的真实身份，进而实现作家对弗洛伊德权威理论的解构。

西格蒙德这种称谓本身容易联想到弗洛伊德。西格蒙德这个名字与奥地利精神病医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相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世界闻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在小说开头，作家对西格蒙德的心理描写提及了事件发生地：“他印象中维也纳从未有过这样的凛冬”(Пелевин 2004: 91)，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生活及工作的主要地点。此外，作家还通过对主人公行为与声音的文字描写，赋予西格蒙德以人的位格，进而肯定主人公心理学家的“真实”身份。作家在前期作品《尼卡》(Ника, 1992)中就使用过同样的语言策略。《尼卡》看似讲述的是一对男女之间感人的“爱情”故事，但是作家通过结尾的揭示，却是一段人与猫的情感故事。“小说中最大的游戏莫过于尼卡的身份。佩列文通过文字游戏对尼卡的描述，很难让读者分辨出尼卡的真实身份。只是在结尾处，作家才揭开尼卡猫的真实身份”(冯雪 2017: 107)。

小说中作家对主人公行为进行描述时使用的一些词组都似乎突出其“人”的特征。在小说开头，“西格蒙德像老年人一样很快进入瞌睡的状态”(В.О.Пелевин 2004: 91)，“像老年人”这一形象比喻与上文提到关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他印象中”，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心理学家”西格蒙德是一位老年人。西格蒙德在咖啡馆既没有吃也没有喝，仅仅是在瞌睡的状态中。但是当咖啡馆迎来客人时，西格蒙德不再打瞌睡，因为对主人公来说出现了可以观察的对象。从这里可以推断出，西格蒙德进入咖啡馆是为了观察人物的行为。此外，“话语刚落，他目不转睛盯着大厅远处的角落”“话语刚落，他把目光转向了男士”“他说完并摇了摇头”(Пелевин 2004: 92)，这些描述是主人公观察人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其中“目不转睛地盯着”(уставился)的具体含义指“不转移目光，全神贯注地看”(Ожегов 1984: 840)，这一动词能够表现出主人公对人物的行为怀有强烈的好奇，侧面体现西格蒙德是一位“富有好奇心的人”。“目光转向男士”表明西格蒙德有意识地将目光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说完摇了摇头”是西格蒙德通过肢体语言，侧面表达对人物行为的评价，能够体现出主人公行为具有人格化的特征。

在声音方面，俄语中有一些专门用来表达鸟叫的动词，这些词都是拟声词。例如：кукарекать、кудахтать、крякать、каркать、чирикать、ворковать等等。在故事《乌鸦与狐狸》中，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就选用“каркать”带有“鸟类特征”的动词，用来描述乌鸦的啼鸣：“乌鸦提高了嗓门儿，尽乌鸦之所能叫了一声(Ворона каркнула во все воронье горло)”(庞文焕 1994: 57)。反观小说，作家对西格蒙德声音的描述中，没有选用鸟叫的拟声词。“西格蒙德惊叫道(воскликнул Зигмунд)”(Пелевин 2004: 97)，该句中作者选用“惊叫道”(воскликнуть)这一动词描述西格蒙德的叫声。«воскликнуть»一词“更突出情感色彩”(Ожегов 1984: 98)，而“каркать”一词不具有情感特征，仅表示“发出声音”的含义(Ожегов 1984: 266)。因此，“惊叫道”更突出西格蒙德人格化的特征。小说中西格蒙德静静观察人物的行为，只通过“Ага”这一语气词表达自己的想法。俄语感叹词“Ага”除了表示“感叹”之外，还赋予动作主人以“首领、检查官的身份”¹，因此这个词汇也同样具有“给……赋予人格”的功能。这是一种语言游戏的手段。“语言游戏”(Sprachspiel)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后期哲学的一个核心术语。他从足球比赛联想到语言的意义，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球场上的运动，在于球只按照比赛规则不停地踢滚传递，而语言的意义也应该在于它们的实际应用，也应当像足球运动那样遵守规则”(刘放桐 2004: 275)。维氏主张不要把语言看作孤立静止的描述符号，而是动态的语言活动。因此，后现代主义写作已经将自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自身”(杨仁敬 2005: 34)。因此，通过作家两方面的语言描述，使西格蒙德的身份更具模糊性，读者很难会对西格蒙德

心理学家的身份产生怀疑。只是在小说结尾，作家通过男士与女店主的对话“您这里居然有如此漂亮的鹦鹉”（Пелевин 2004： 99），揭示出西格蒙德鹦鹉的真实身份。后现代主义理论集大成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中，将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定义为后现代主义主要的写作原则。哈桑认为，“不确定性具有模糊性、不连续性、异端性、多元性、曲解性等多种含义”（张朝霞 2019： 78）。因此，作家通过模糊西格蒙德形象，使主人公身份具有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小说形象的不确定性，使得每一句话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后一句话推翻前一句话，后一个行动否定前一个行动，形成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消解状态”（陈世丹，孟昭富 2003： 83）。由此可以看出，西格蒙德身份的不确定性，是对弗洛伊德权威身份的解构。

除了主人公身份具有不确定性，人物间的关系也具有不确定性。小说中的三组人物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作家明确指出小男孩与小女孩是女店主的孩子，所以这一对的关系具有确定性，是家庭关系。但是男士与女士、女店主与男雇员这两对人物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首先，在女士和男士的场景中，他们的行为能够体现“他们彼此好感并且相互关切”这一特征。一方面，女士对男士“赞许微笑”（Пелевин 2004： 92）的举止，能够表达出（尽管由于男士的忽视使她的包被雪弄湿了）她对待男士是一种较为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男士对女士则是一种殷勤的态度。在小说中，作家多次把男士描述成为男伴（кавалер）。例如：在男士与女士吃饭的场景中，“女士向男伴说了些什么”（дама стало что-то говорить своему кавалеру）（Пелевин 2004： 94）。《кавалер》主要有两层含义：“1.被授予（卫国战争）勋章的人 2.男人主动追求自己的女舞伴，并在生活中照顾她”（Ожегов1984： 224）。男伴的第二层含义更符合小说的内容，所以把他们的关系归结为夫妻关系不具有合法性。根据弗洛伊德理论，男士与女士的行为实际上具有“性暗示”特征（关于这一点会将在下一小节进行分析）。因此，男士和女士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可以是情侣关系，也可以是在朋友、同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情人的可能。在女店主和男雇员的场景中，尽管根据工作关系男雇员应该服从女店主，但是在作家的笔下他们被描述成相对和谐的一对。女店主和男雇员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工作关系，也可以是暧昧关系。小说中作家利用搭档（напарник）描述女店主和男雇员之间的关系。当女店主与男雇员更换灯泡时，女店主险些从楼梯上跌落下来。“女店主吓得脸色苍白，从地板跳下，无力地倒在了搭档慰藉的怀抱中”（обессиленно замерла в успокаивающем объятии напарника）（Пелевин2004： 96），其中搭档（напарник）所代表的含义是“在双人合作中完成个人职责的员工”（Ожегов 1984： 329）。这一场景的描写体现出二人实际上是平等搭档的关系，即一起完成一件事。联系到弗洛伊德理论，搭档还具有伙伴（партнер）另一层意义：“伙伴——某种游戏或协作项目的参与者”（Ожегов 1984： 429）。搭档这一潜台词暗含着参与者之间存在某种合作的意味。在性关系中伙伴通常是平等的，如同搭档在某一劳动进程中具有平等一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女店主和男雇员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归为工作关系，其关系也具有不确定性。综上所述，作家利用文字游戏，有意模糊男士和女士、女店主与男雇员之间关系是为了使小说潜文本与弗洛伊德潜意识论构成内在关联，从而实现消解其理论的目的。

3 对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消解

在《西格蒙德在咖啡馆》中，作家借用弗洛伊德潜意识论，使主人公与三组人物的行为构成了内在的关联。然而西格蒙德这一鹦鹉的形象，是作家对弗洛伊德的改造，体现出对弗洛伊德身份的戏弄，这个戏弄又显露出对前文内在关联的否定。

在心理分析理论中，“弗洛伊德更关注人的潜意识，认为潜意识的动机是植根于本能（力比多）的欲望，这些动机能够使人们成为自己潜意识的奴隶”（郝敬习 2009： 62）。在心理学家看来，潜意识的基本内涵就是性原欲的冲动，但是性本能通常处于压抑的状态，因此人们会通过譬如：带有象征意味的梦等间接方式来满足本能欲望。关于象征与梦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明确指出“象征并不专属于梦，而属于潜意识的想象。特别是关于人的那些象征，许多人的具体的象征都是个体性的，其意义只有通过从替代物开始的自由联想与生活史的重构才能获得”（靳婷 2008：93）。因此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象征都是性象征。小说中，在没有揭示主人公真实身份之前，西格蒙德始终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对每一组人物进行观察。值得注意的是，西格蒙德在观察人物行为的过程中，不断重复“Ага”这一感叹词。该词对于“心理学家”西格蒙德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感叹，而是当他发现三组人物的行为与“自己建构的潜意识论”相一致时，所抒发的感叹。

第一组男士和女士的外表描述中，“高假发”“络腮胡”以及高贵的服装（皮衣、天鹅绒夹克）能够体现出这是一对体面的人物。其中“高假发”“络腮胡”“长尖雨伞”“把帽子放在挂钩上”“敞口包中装满的雪”（Пелевин 2004：91）等描述，都具有一定的性意味。在男士与女士吃饭的场景中，性象征明显增多。诸如：“男士用力地拿刀将牡蛎外壳剥下，大口吞下”“女士把香菇放进嘴里”“奶油掉在了男士的掌心中”“男士把香烟装进圆锥形状的红烟斗中”（Пелевин 2004：95）等描述。如果在小说前期的场景描绘中，作家对性象征带有某种程度的伪装，那么性象征在随后的场景尤为明显。弗洛伊德认为，“在象征作用下，替代物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而且是在防御的帮助下产生，也就是说象征作用和象征性活动都是压抑和被压抑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靳婷 2008：93）。表面上看，男士和女士这一对没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通过前文的分析，能够发现性被压抑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人物是借助替代物以及象征行为来满足潜意识的欲望。女店主与男雇员这一对，作家对人物的外表描述“健壮结实”和“丰满”强调了人物的身体特征。“女店主去取旧式双耳罐（这是一个能存酒和粮食的容器）”“用力的打开盖子”“用力点了点头”“猛然进入黑色方形物深处”“男雇员直勾勾地盯着女店主胖乎乎的手掌，不断地用舌尖舔着干涩的嘴唇”（Пелевин 2004：96）等行为的描述，性意味尤为明显，侧面体现出女店主这一对的行为更具随意性。除此之外，对于女士（“她将烟斗塞进嘴里，用牙齿咬住它”）（Пелевин 2004：96）与女店主（“店主从他手里拿过灯泡，用手擦了擦，就把它放进口中，小心地用双唇包住灯泡头”）（Пелевин 2004：95）嘴部的行为描述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较于男士这一对的行为，女店主与男雇员本能欲望的表现更加直接。因此，女店主与男士两组人物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差距。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场景中，孩子们十分安静地沉浸在自己的玩耍中。小男孩用积木搭建房子，小女孩则是坐在男孩相反的方向一会摆弄硬币，一会摆弄布娃娃。“弗洛伊德主义者更加关注孩童时期的臆想以及游戏，儿童不能够领悟成年人的思想及其行为，所以他们更容易体现潜意识的行为”（大卫·斯特福-克拉克 1989：89）。由此可以看出，小男孩无意识的行为，是基于成为父亲这一潜意识动机。而小女孩的行为是基于成为母亲的动机。除此之外，“小男孩搭房子时，积木掉进了裂缝中”“小女孩伸出舌头啃咬金丝雀玩偶的尾巴”（В.О. Пелевин 2004：86）等行为的描述，也是人物本能欲望的间接体现。综上所述，虽然三组人物代表不同的社会身份，但是人物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性暗示的特征，所以西格蒙德才发出“啊哈”的感叹。

小说结尾处，作家通过男士与女主人之间的对话（首先，男士向女店主赞美西格蒙德是一只漂亮的鹦鹉。随后，女店主抱怨西格蒙德弄脏了笼子。男士认为只有鹦鹉住在这里，这是西格蒙德自己的笼子，不需要任何人的评价，以此来反驳女主）。进而否定小说的内在关系。这一对白具有三层含义。第一，西格蒙德身份的反转，直接推翻了“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分析的结论。动物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所以鹦鹉的分析不具有合法性；第二，没有人强迫它定要弗洛伊德主义的“眼光”看待人物的行为，这是西格蒙德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他不需任何同情以及评价；第三，“弄脏的鹦鹉笼子”侧面体现出本能欲望在某种程度是“肮脏”的，因此本能欲望必然会被社会准则所取代。综上所述，由肯定和否定形成的内在关联是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反思和颠覆，进而表达出作家对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质疑。

4 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戏仿

戏仿是佩列文的另一个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作家将戏仿作为一种破坏性的模仿，在讽刺性破坏中把“模仿”变为“改写”，超现实主义作品就成为佩列文戏仿的对象。小说中，作家戏仿超现实主义理论家（路易斯·布努埃尔，萨尔瓦多·达利）作品中“钢琴”这一共有的片段，并丑化两位理论家的形象，将模仿与改写的痕迹消融在一幅超现实主义绘画中，从而达到反讽的效果。

在小说中，西格蒙德不仅对三组人物进行了观察，还对咖啡馆中的两幅油画进行了观察。相较于第一幅海景画，西格蒙德更关注第二幅超现实主义油画，主人公对该油画的内容进行了详细描述。画中主要描绘了在两架敞开的钢琴上分别躺着两位死者：一位是萨尔瓦多·达利，另一位是路易斯·布努埃尔。此外，两人都长着怪异形状的长耳朵。作家借用超现实主义油画，表达出对超现实主义者盲目崇拜弗洛伊德潜意识行为的嘲讽。因此，该画对于揭示小说的中心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与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艺和文化思潮，其产生的标志是1924年法国作家布洛东在巴黎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宣言》和同年成立的“超现实主义研究室”。布洛东声称：“超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发现了精神世界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一个被眼前的现实物欲生活抛弃了的世界，即超越现实的似梦的想象世界。可见‘超现实主义’者试图借助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把现实生活与本能、无意识和梦的经验糅合在一起，以达到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情境”²。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对超现实主义流派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萨尔瓦多·达利是著名超现实主义绘画领域的主要代表，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他创造出了一种偏执狂批判方法，这种形式的表现形式是追求潜意识、非理性和幻想，在现实世界中穿插混乱的梦境世界，用夸张、变形、扭曲的具体意象来表达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他关注的是生命意识中神秘的生死、变态、性爱和对宇宙的想象。³因此，达利主要将弗洛伊德潜意识论运用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是20世纪艺术领域宣扬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代表。画家的一幅代表作品《部分幻觉：列宁在钢琴上的六个影像》中，主要描绘了房间中有一位男士，他就坐在一架钢琴的对面，同时注视着钢琴上面的乐谱。值得注意的是，钢琴上面有六个列宁的影像。在路易斯·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这部电影作品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桥段：一架钢琴上面躺着一匹死驴。路易斯·布努埃尔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导演，也是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重要继承者。《一条安达鲁狗》表达了这样的电影创作理念：“影片集合了超现实主义美学以及弗洛伊德的发现，这一流派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一种非心理的无意识行为，它能还原人的思想以及不受理性、道德和美学约束的本来的功能。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是：影片主人公的行为是受到冲动的驱使，这种冲动的主要源泉同非理性的源泉交融在一起，这部影片把目标对准了人下意识的情感，所以它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对于某个社会集团和清教徒的道德准则来说，它大概是令人不快的”（费尔南多·塞萨尔曼1989：138）。由此可以看出，布努埃尔基本借用潜意识论来阐释作品的主题。反观小说中的这幅油画，佩列文通过戏仿“钢琴”这一场景，与两位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构成超文本互文。画中两位人物带有特殊形状的长耳朵，暗示超现实主义理论者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关联。此外，作家把两位理论家描述成躺在钢琴上的死者，侧面揭示超现实主义理论者盲目推崇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做法，必然导致弗洛伊德这一理论走向僵化、甚至消亡的结局。

佩列文引用了《复活节岛》的诗句作为小说的题词也具有相似的隐喻：“这些‘偶像’光滑的石像面孔下，隐匿着纵横交错的裂缝和空洞，奇珍异鸟居住在其中。”（За гладкими каменными лицами этих истуканов нередко скрываются лабиринты трещин и пустот, в которых селятся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птицы）（Пелевин 2004：91）。其中“истукан”一词除了“偶像”含义，还有一层“木头人、笨蛋（讽刺受崇者的称呼）”（Ожегов 1984：256）的转义。

因此，“偶像”一词暗指超现实主义者狂热迷恋的“僵化的潜意识学说”，即在弗洛伊德学说的背后有一批盲目模仿的“鹦鹉”。这些“鹦鹉”对偶像学说不假思索、无意识的仿效，导致偶像学说逐渐空洞、僵化、甚至消亡。

5 结束语

西格蒙德的鹦鹉身份具有一定的隐喻性。鹦鹉这一形象能够表示相关的特征：“鹦鹉——盲目模仿（Попугай—попугайничать）”（王松亭 1990：138）。因此，鹦鹉暗指超现实主义者对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盲目态度。著名的心理学家亚罗舍夫斯基指出：“弗洛伊德理论下的性焦虑已成为各类条件下研究人类行为的范例，因而使人类对这类范例形成了某种臆断。而客观的科学真理却成为了一种令人只能对其‘盲目膜拜’的无稽之谈”（М.Г. Ярошевский 1989：10）。因此，即使是20世纪在心理分析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会变成石像一样僵化的神话。

附注

1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акса Фасмера <https://reword.org/online/>

2 转引自杨晓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超现实主义及达利美术创作的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07 第 1 期。

3 转引自刘骁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达利艺术创作的影响》，《艺术与设计》2019 第 2 期。

参考文献

- [1] Колесникова А. Ю., Крюкова Л. Б.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й текст : 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в иноязычной аудитории [J]. Вестник ТГПУ, 2016(10).
- [2] Ожегов С. И.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4.
- [3] Пелевин В. О. Зигмунд в кафе // Русская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проза конца XX века [C].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04.
- [4] Ярошевский М. Г. Психология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 Сб.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C]. Сост., науч. ред., авт. вступ. ст.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9.
- [5] 陈世丹. 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存在 [J]. 外国文学, 2005(4).
- [6] 陈世丹, 孟昭富. 约瑟夫·海勒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 [J]. 国外文学, 2003(4).
- [7] 大卫·斯特福—克拉克. 弗洛伊德究竟说了些什么 [M]. 姚锦清, 应亚平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9.
- [8] 费尔南多·塞萨尔曼. 从《一条安达鲁狗》谈起 [J]. 郑黎明译.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1989(2).
- [9] 冯 雪. 佩列文小说《尼卡》中的后现代自我意识 [J]. 现代交际, 2017(18).
- [10] 郝敬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及其人性观 [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9 (3).
- [11] 靳 婷. 以《红楼梦》为例浅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中的象征性 [J]. 语文学刊, 2008(20).
- [12] 庞文焕. 俄语中表示动物“叫”的动词 [J]. 俄语学习, 1994(6).
- [13] 刘放桐. 新编现代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4] 王松亭. 俄语动物名词的修辞应用及其形象性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6).
- [15] 杨仁敬.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5.
- [16] 杨晓庆. 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超现实主义及达利美术创作的影响 [J]. 河西学院学报, 2007(1).
- [17] 张朝霞. “不确定性”的精妙——论《天堂》中人物刻画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 [J].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1).

"Freud Is Not in the Cafe"

— On Pelevin's D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Subconsciousness

Liu Yu-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igmund in the Coffee Shop*, a short story written by Russian novelist Pelevin, fully manifests the doubts of Freud's subconsciousness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First of all, the writer deconstructs Freud's authorit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ncertain identity of Sigmund (who is a parrot). Secondly, Pelevin uses Freud's theory of subconsciousness to associate the behaviors of three groups of people in the novel, so as to deconstruct his theory. Finally, the author further expresses his doubts about Freud's subconsciousness by satirizing the blind worship of Freud's successors.

Keywords: V. Pelevin; Freud; theory of subconsciousness

作者简介：刘雨馨 (1997—)，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20-03-01

[责任编辑：刘 锟]